

有声思维模型在本科翻译教学中的应用、问题和对策

肖鸿飞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西九江 332020)

[摘要]作为一种常用的质性研究工具,有声思维模型在国内翻译教学中的使用和研究仍较为有限,但该方法可以帮助翻译教师近距离观察学生的翻译过程,深入挖掘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国外已有的有声思维模型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存在实验设计松散的问题,缺乏对实验过程的科学把控。本文从实验设计角度进行分析,提出在翻译教学中应用有声思维模型时,应对实验对象的选取、文本的难度、翻译质量评估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科学的考虑。特别是在文本选择方面,需结合学生的学习阶段与实验目标,确保实验能有效反映学生的翻译能力;在翻译评估方面,应采用多层次的方法,既考虑微观的词汇与句法因素,也包括宏观的逻辑与目的性,以提升有声思维模型在翻译教学研究中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有声思维模型;翻译教学研究;文本难度;翻译评估

[作者简介]肖鸿飞(1990—),女,江西南昌人,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翻译教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省级重点课题“新时代‘三进工作’背景下的浸润式翻译课程思政创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JXJG-22-32-2)。

[DOI]https://doi.org/10.62662/kxwxz0111012

[本刊网址]www.oacj.net

翻译活动是以过程为导向的思维活动,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而针对翻译过程的研究也已成为当代翻译主流研究中的一个分支。研究人员如果可以获取译者翻译时大脑思考过程的实证数据,将极有助于为翻译技巧及策略的成功使用提供可靠依据。对翻译过程和译者思维过程的关注促使翻译学的认知转向,许多认知科学中的工具,如眼动仪、脑部核磁共振、访谈、有声思维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翻译研究。同样,翻译学科和教学的发展从探索、变革到成熟发展,经历了从“感性演说到科学建构”的转变(仲伟合、赵田园,2020)。这意味着,翻译教学再也不能唯教师感觉论,单方面以教师个人经验作为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依据,而需要关注学生译员的思维变化。只有为学生在翻译课堂活动中的角色赋予更强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才有可能培养出合格的译员。有声思维模型从其可获得性与可操作性方面考虑,可以成为翻译教师了解学生翻译过程的实用工具。然而有声思维模型作为质性研究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其有效性方面受到了一定的

诟病和质疑,如受试者的语言能力、记忆的存储能力等会影响其在实验过程中所获数据的数量,同时以边思考边表达的方式进行任务,可能会影响受试者的思考而影响任务执行的效果。然而,影响有声思维模型效用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不谨慎的实验准备。本文将从质性研究设计的角度对现有研究的核心论点进行归纳,对不足之处进行拓展。

一、有声思维模型及其在翻译领域中的应用

Dörnyei(2007)将有声思维模型(Think-aloud protocol)研究法归纳为质性研究工具中“内省法”的一种,并将其过程表述为“口述内心言语而不提供任何的分析或解释”,而在翻译研究中,这种表述可以用作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所获得的研究数据(Jääskeläinen, 2010)。作为认知心理学中一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有声思维模型的应用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虽然在最早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出于教学目的使用该模型演绎翻译过程所获得的实证数据不够丰富(Kusssmaul & Tirkkonen, 1995),研究对象的背景却相对多样,其中包括外语学习人员

(Krings, 1986)、翻译专业学生和专业译员,但实验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仅限于英语和其他欧洲语言之间。到了二十一世纪,有声思维模型被应用于研究翻译策略(Eftekhary, 2012)、评估翻译能力(Orozco & Hurtado, 2002)以及观察翻译的速度、修订和间断次数等方面。

Kussmaul 和 Tirkkonen-Conditt (1995)总结了有声思维模型在翻译教学领域的实用性:首先,通过有声思维实验所获数据,建立翻译模型并为翻译任务的实施提供指导;其次,对正在受训的翻译专业学生而言,有声思维模型可以帮助翻译教师发现学生翻译过程中的问题,同时避免在翻译教学中做出无事实依据的主观决策。Li (2004)提出有诸多因素会影响有声思维模型的可信度,他将有关因素总结为14点(具体介绍这14点)。在这14点中,目的抽样、信息收集方式多样化,创造最贴近翻译实景的情境以及实验数据的深度解读,是相关研究者考虑最多的因素,而对受试者的培训,因实验时间过长没有受到充分的关注。然而,在这14个因素以外,实验过程中所使用文本的难度被忽略。Jääskeläinen (2000)表示,若实验文本难度过大,会对受试者造成较高的认知负荷,其结果是有声表达过程会受到影响,而对难文本的恐惧也可能会影响受试者的行为。然而,如何界定文本难度,Jääskeläinen 和其他研究者并没有提供解释。

二、翻译研究有声思维模型及文本难度

有关文本难度的论述,虽然研究者各有不同表述,但是能基本达成共识。

Campbell (1999)从认知学角度讨论了翻译中源文本的难度问题。他首先提出翻译中文本的难度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衡量:源文本、翻译任务以及译者能力。围绕源文本,他认同其他学者如 House 以及 Hatim 所提出的文本类型会造成文本难度差异的指称,但他进一步认为文本本身已具备难度水平,并通过实证研究论证了其真实性。基于认知学,他提出文本难度要从对人脑工作记忆所造成的负荷的大小进行判定,凡是涉及长期记忆的调动,短时间无法迅速反应,包含对人脑工作记忆造成较大负担的语法知识,都可以被判定为具有难度的文本。其研究结果表明,词汇类型,如动词、含义抽象以及复杂的名词词组均会影响文本难度。文本类型以及语言学问题,如词汇、句法等形成的难度,是文本难度中最主要的两个要素。其他表述,如 Reiss

(1981)提出影响文本难度的五个因素包括:主题内容(语义角度)、语域、语言类型(功能角度)、文本语用以及历史文化背景。Nord (1991)将造成翻译困难的问题划分为:文本类型问题、语用问题、文化问题以及语言对问题(即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Hornby (1988)根据格式塔理论将翻译分类为文学文本(如圣经、电影、诗歌、小说等)、一般文本(如报纸、广告等)以及特殊语言文本(如法律、医药、科技等文本)。但 Sun (2012)指出,该种分类不能作为文本难度的一种标准,文本的语言因素没有被纳入考虑范围。那么,在翻译教学领域中,有声思维实验在筹备阶段时,文本应从哪些方面考量?

首先,文本类型选择应结合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以及实验目标。本科阶段的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笔译课程包括汉英笔译、英汉笔译、应用文体翻译、旅游翻译、经贸翻译等。汉英笔译和英汉笔译课程正常在二年级进行,以文本类型为主题的翻译课程在大三进行。那么,在选择文本时,从学生已经接触过的文本类型入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但是,一味地照本宣科并不符合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适当地观察学生对不熟悉的术语和句义的处理,更能在学生翻译对策的构建方面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此外,实验目标将很大程度决定文本类型的选择。如若实验目标为观测学生对文化负载词、诗学成分等与文化、文学相关内容的处理,那么文本也应该往这方面倚重。

其次,文本长度需依据学生能力水平。在 Bernardini (1999)针对4位专业译员和老师进行的有声思维实验中,选择的文本为长度约为100词左右的科技新闻文本。该长度被描述为“较短”。Aly (2004)年进行的有声思维实验中,12名同学进行了10个句子(目标语为英语)和2个段落(源语为英语)的翻译,两个段落的长度分别为47和81个英文单词。Jakobson (2003)的实验中采用了四个文本,两个丹麦语文本和两个英文文本,英文文本字数分别为760词和1001词。所需翻译的文本越长,造成的认知负荷便会越重,然而文本过短,可能会限制受试者思维的充分开发且无法观察受试者在处理篇章翻译的过程中对文章逻辑的把控能力。研究者应根据研究条件,以某些量化指标作为参考,例如,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三级(CATTI 三级)。三级笔译实务包含中译英与英译中共两篇文章,限时三小时,笔者统计了近五次三级笔译源文本的字

数,英文文本平均字数为 556 词,中文文本平均字数为 445 词。但众所周知,CATTI 考试通过率较低,且许多参加者在限定时间内无法完成两篇文章的翻译。作为一个量化指标参考,研究者可以尝试从词、句、语篇等角度,锁定量化指标作为实验文本难度的参考范本并预估其时间成本。在此过程中,采用预实验和问卷调查方式,来检测文本的难度和学生的可承担性,亦有必要。

三、翻译教学有声思维模型设计中其他考量因素

除文本要素外,有声思维实验设计还需衡量其影响因素:如样本量、抽样方法、翻译评估方法等。

首先,样本量问题。Jäskeläinen(2002)总结了 1980 年至 2000 年间发表的 108 篇有声思维模型和翻译研究主题论文,其结果显示,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有声思维研究中,样本量为 4 人到 24 人不等,大部分研究的样本量大约在 10 人左右。与量化研究中样本数量越多越好不同,因质性研究产生的数据以文本为主,样本量过大会造成研究分析过程长、负荷重,大量重复及冗余数据也会影响研究效率。Dörnyei(2005)提出,质性研究样本数量应灵活对待,并根据研究进程适当添加。同时,他建议,采用诸如访谈法等产生文本数据的质性研究方法,初始样本量可在 6~10 人之间,但如果研究过程人员充足,且在计算机辅助的情况下,则初始样本数量可以扩大至 30 人。Glaser & Strauss(1968)提出,样本总量的最佳数量应参考的标准是:所增加的样本数据中所提取的观点只是对已有观点的不断重复,即可视为样本量满足研究所需。然而在实际研究中,研究人员会基于已有可靠的理论成果、时间与资金的限制等现实因素综合考虑(Eisenhardt, 1989)。以教学为目的的有声思维实验中,参与者的背景会受到研究者工作背景的限制,可能只来自于某一个高校,那么在实操中,研究人员则只能根据其工作条件(年级、班级数及学生总量)对参与者进行招揽。在该条件下,如为确保实验结果能具有推广性,则应对参与者的背景进行详细的记录和分析。

第二,抽样方法。以提高教学质量、研究教学方法为目标的质性研究中,随机抽样法并不适用。由于教学对象的特定性和有限性,所取样本首要考虑的要素是研究结束后,研究成果是否具备普适性(能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需求)。因此,目的分层抽样方法更为适用,如 Patton(2002)的观点:目的

分层抽样方法可以帮助实现样本差异化,保障实验结果具有整体代表性,而 Suri(2011)则更早提出上述抽样方法对于教学目的的质性研究尤为适用。采用目的分层抽样方法首要考虑分层方式和依据,其中学生翻译能力将成为主要标准。翻译能力的评估,可以通过两种手段进行。第一,参考学生翻译资格考试的结果,如 CATTI 翻译能力考试、上海口译资格证笔试成绩以及大学英语四六级成绩;第二,进行预测试,通过让学生进行段落翻译测试来评估学生的翻译能力。但目前高校翻译专业教师在进行翻译质量评估的标准上主观成分较多,量化指标的使用范围较窄,造成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较低。同时,预测试中使用何种类型的文本作为内容又是一个问题,因此,从时间成本和工作效率两个方面考虑,第一种标准更加客观、高效。

在本科阶段,按照课程设置,一年级与二年级学生还在建立翻译思维、培养基本翻译思路的阶段,三年级后则会从不同文本类型并按照口笔译分类,进行更多专业课程。不具备基本翻译概念的对象不适合参与有声思维实验,因为学生在该阶段更多地是使用本能并基于他们已培养的英语读写能力进行直译,因此,研究数据可能面临的是大量有关词汇缺乏的表述,而研究者想看到的翻译策略的数据可能寥寥无几。

此外,抽样过程应避免任何会影响学生翻译自信和表现的外在因素。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就意味着研究者必须参考标准,学生能力会有低、中、高三等。如果在向学生发出邀请的过程中,研究人员详细介绍实验的抽样标准,势必对未来的参与者的自信造成打击,对实验过程的充分性更会造成威胁,对实验的声誉也是一种损害。因此,研究者要采取有条件的信息披露策略,或通过签署保密协议等形式,将参与者直接相互进行信息沟通的概率和频率降低。

第三,翻译评估方法。翻译质量评估是翻译研究中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翻译质量评估标准的发展进程,经历了从理论讨论阶段,到质量评估模型的构建阶段,再到量化标准和评价的阶段。不同质量评估标准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一,翻译质量评估因评估导向不同而产生的差异。Orlando(2011)提出,翻译评估中值得考量的因素众多,在无法将所有要素皆囊括在内的限制下,要以翻译目的、质量和效果为内核,翻译评估的标准要对初始

研究目标进行追溯,包括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估体系(product-oriented)以及以过程为导向的评估体系(process-oriented)。他基于两种侧重分别设计了评估量表,而以过程为导向的评估量表中,增加了对翻译策略、文本校对等方面的标准。第二,对翻译文本功能的侧重不同而造成的评估标准差异。Coline(2008)在对过往的翻译质量评估标准无法在理论性与实用性之间达到均衡而进行了批评,并基于“功能—文本构成”方法(functional-componential approach)设计了翻译质量评估表(TQA form)。

翻译文本评估运用在有声思维模型相关研究中还处于空白状态,但对翻译文本进行评估意义重大。研究者们无法只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行为来判定该行为的优缺点,或者只基于有声思维模型中所观测到的译者思维形态即判定该行为是否恰当,而相关行为的效应需要一个结果进行参照。最直接的参照是翻译的成果。虽然质性研究的成果依赖于研究人员的主观能力,但采用可靠的翻译评价体系,会有效地提升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对翻译文本的侧重点不同,进行翻译评估的方法会有所不同。同时,作为量化评估指标的补充,研究者同时可以采用事后访谈、报告等方式,给予受试者机会来阐述其采用某种策略的原因。整体来说,翻译质量的评估既要考虑词义、句法等微观要素,又要考量逻辑、通顺等中观要素,还需要囊括翻译目的、读者等宏观角度,这几个层面缺一不可。

四、结论

本文从翻译教学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讨论了有声思维模型在协助研究人员发现学生翻译问题、协助教师调整翻译教学策略方面的效用以及在实验设计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其中,本文着重强调了文本选用和翻译评估在实验中的重要意义,而这两点在过往研究中常遭忽略。有声思维模型容易遭到怀疑的原因之一,在于其设计的完整性、实验环节的科学性没有获得充分考虑。但研究者不能忽略其在近距离观测译者思维上能够提供直观数据的便捷优势。

参考文献:

- [1] 仲伟合,赵田园. 中国翻译学科与翻译专业发展研究(1949-2019)[J]. 中国翻译,2020,41(1):79-86.
- [2] Dörnyei, Z.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Jääskeläinen, R. Think-aloud Protocol[J]. Handbook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10(1): 371-373.

- [4] Gerloff, P.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Reports on the Interpretive Process [A]. House, J. & Blum - Kulka, 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243-262.

- [5] Lörscher, W.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Towards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Performance [A]. House, J. & Blum - Kulka, 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277-292.

- [6] Kussmaul, P. & Tirkkonen-Condit, S. Think-aloud Protocol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J]. TTR: Traduction, Terminologie, Rédaction, 1995, 8(1): 177-199.

- [7] Krings, H. P.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Advanced German Learners of French (L2) [A]. House, J. & Blum - Kulka, S. Interlingu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Transl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C]. Tübingen: Gunter Narr, 1986: 263-276.

- [8] Jakobsen, A. L. Effects of Think Aloud on Translation Speed, Revision, and Segmentation [A]. Alves, F. 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 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3: 69-95.

- [9] Tirkkonen - Condit, S. Who Verbalises What: A Linguistic Analysis of TAP Texts [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 9(1): 69-84.

- [10] Séguinot, C. Some Thoughts about Think - aloud Protocols [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6, 8(1): 75-95.

- [11] Eftekhary, A. A. & Aminizadeh, S.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Thinking Aloud Protocols in Translation of Literary Texts [J].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anguage Studies, 2012, 2(5): 1039-1047.

- [12] Orozco, M. & Hurtado-Albir, A. Measuring Translation Competence Acquisition [J].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02, 47(3): 375-402.

- [13] Li, D. Trustworthiness of Think-aloud Protocols in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Process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04, 14(3): 301-313.

- [14] Jääskeläinen, R. Focus on Methodology in Think - aloud Studies on Translating [A]. Tirkkonen - Condit, S. & Jääskeläinen, R. Tapping and Mapping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utlooks on Empirical Research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71-82.

- [15] Campbell, S. A Cognitive Approach to Source Text Difficulty in Translation[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9, 11(1): 33-63.
- [16] Reiss, K. Understanding a Text from the Translator's Point of View[J]. *The Bible Translator*, 1981, 32(1): 124-134.
- [17] Nord, C.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Christiane Nord and Penelope Sparrow. Amsterdam/Atlanta: Rodopi, 1991.
- [18] Snell-Hornby, M.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88.
- [19] Sun, S. Think-aloud-based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Some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J]. *Meta: Journal des traducteurs/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2011, 56(4): 928-951.
- [20] Bernardini, S. Using Think-aloud Protocols to Investigat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Methodological Aspects[D]. Bologna: University of Bologna, 1999.
- [21] Aly, M. A. 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EFL Student Teachers: A Think Aloud Protocol-Based Case Study[EB/OL].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90356.pdf>.
- [22] Jääskeläinen, R. Think-aloud Protocol Studies into Transla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 *Targ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2002, 14(1): 107-136.
- [23] Dörnyei, Z. The Psychology of the Language Learn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24] Glaser, B. G. & Strauss, A. L.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M]. Chicago: Aldine Publishing, 1967.
- [25] 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532-550.
- [26] Patton, M. Q. Qualitative Research & Evaluation Methods (3rd ed.)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27] Suri, H. Purposeful Sampl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J].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2011, 11(2): 63-75.
- [28] Orlando, M. Evaluation of Translations i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At the Crossroads Between Theoretical, Professional and Pedagogical Practices[J]. *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 2011, 5(2): 293-308.

The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ink-aloud Protocol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XIAO Hong-fe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Jiujiang Jiangxi 332020, China)

Abstract: As a commonly used qualitative research tool, the think-aloud protocol has been relatively underutilized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research within China. However, this method allows translation teachers to closely observe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and identify students' issues effectively. Existing foreign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ink-aloud protocol in translation often shows loos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a lack of scientific rigor. This paper analyzes experimental design aspects and proposes that when applying the think-aloud protocol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comprehensive and scientific considerations should be given to participant selection, text difficulty, and translation evaluation. Specifically, the selection of texts should align with students' learning stages and experimental goals to ensure an accurate reflection of their translation abilities. For translation evaluation, a multi-layered approach should be adopted, encompassing both micro-level aspects such as vocabulary and syntax and macro-level elements like logic and purpose. This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ims to enhance the relia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think-aloud protocol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research.

Key words: think-aloud protocol; translation teaching research; text difficulty; translation evaluation